

救國會派的興亡

王覺源

中國黨派滄桑錄之二

中共外圍統戰工具

「救國會派」，亦稱「救國派」，係中國對日抗戰初期，「中國民主同盟」組合的三黨三派之一。救國會，原是抗戰前夕，在上海成立之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」的簡稱。這是中國共產黨藉口抗日，利用國人救國心理，號召統一戰線，所策動組織之團體。作為共黨外圍機構，成其統戰工具。易言之，即中共假抗日救國之名，集結各種勢力，以壯大自己的策略運用。

民國二十年「九一八」，日軍進攻我東北瀋陽的事變發生，國人反日情緒，極度高漲，政府決心抗戰，亦在積極準備。惟中國共產黨，則陰謀利用外患，充實自己，擴大叛亂。當時他們為利用國人反日情緒，對於蘇俄一九三二年所號召的「統一戰線」，做得最為有聲有色。所謂「統一戰線」，又稱「聯合戰線」，簡稱「統戰」。乃共產黨重要術語之一。亦共產黨階級鬥爭重要策略之一。其意義，即蘇俄列寧所說的：「聯合次要敵人，打擊主要敵人」。然後次第消滅敵人的戰略戰術。共產黨在進行階級鬥爭時，原有三

大法寶：黨的領導、武裝鬥爭、統戰策略。故統一戰線，即其鬥爭過程中的主要策略或手段。

蘇俄統一戰線的號召：當一九三四（民國二十三年）年，法國共產黨摩里斯託斯，提出「人民陣線」的口號時，共產集團的統一戰線，似已逐漸達到完成階段。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，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，曾決議：「放棄階級鬥爭，採用人民陣線，以對抗法西斯的國民陣線。各國共產黨於其本國內，拉攏一切反法西斯勢力，以建立人民陣線，作為政治鬥爭的運動」。以「人民陣線」代替「統一戰線」，實質與策略，並無不同。自此而後，所謂人民陣線運動，即在法國與西班牙等國，轟動一時。我國不少自命為前進的知識份子，不明究竟，不察內容，亦多聞風嚮往之。此時適中共在江西遭到國軍第五次圍剿，無法立足。經過所謂「二萬五千里長征」的流竄，達到西北。企圖進擾山西，復被國軍攔擊。乃返陝北延安，實已日暮途窮，幾瀕消滅。因利用國難當頭，假藉抗日為名，號召統戰，多方詐騙，中共才漸漸得以復活起來！

中共利用「九一八」事變國人之反日情緒，

號召統一戰線，偽裝抗日。二十三年四月，曾發表所謂告民衆書，要求：「一切願意反對帝國主義的中國人，必須在反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下，與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作戰」。此即中共「統一戰線」口號的最早提出。中共企圖進犯山西期間，二十五年四月，又發表所謂「創立全國各黨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」。要求各黨派「為抗日救國而大家聯合起來！」從此，所謂統一戰線，亦成了中共利用各黨各派的法寶。

野心家的政治風雲

未久，西班牙人民陣線失敗了；法國人民陣線，則造成反叛作亂。世人即已深知：人民陣線的組織及其各種活動，無一不為共產國際之陰謀。國人以人民陣線與中共既有密切的關係，亦無不懷疑恐懼！中共鑒於國內外環境變遷。已知人民陣線，不能繼續利用作為號召。乃將人民陣線，更名為「抗日聯合陣線」或「民族統一戰線」。實際還是「統戰」。作用和目的，亦仍舊換湯不換藥。

中共統戰活動擴大展開之日，正是日本軍閥

積極侵華之時。中共乘虛蹈隙，除作統戰的宣傳外，並積極展開其實際行動，支援各種各色的統戰組織。一般失意的官僚、政客、軍閥，各黨各派以及左傾人士，受到中共統戰活動的影響和鼓動，自然見獵心喜，隨聲附和，逐浪追波，咸欲藉此機會，以滿足其政治野心！中共此一統戰活動，發動於北平、天津；大盛於上海，波及於各省市。未及一年，歪風吹遍了全國，無處沒有統戰組織；自然以上海為尤甚。

「九一八」事變以後，上海反日的書報雜誌，原已盛極一時。自中共展開統戰活動以後，若干刊物則多傾向於中共，接受中共的領導。如「大眾生活」、「救國時報」、「抗日先鋒」等等，皆是，且全作了中共統戰的宣傳工具。其尤堪重視者，即二十四年以後，各種救國團體之組織，風起雲湧。不僅上海，也瀰漫於全國。中共對於這些團體的組織計劃與步驟：第一步，組織各個團體救國會；第二步，組織各類團體救國聯合會；第三步，組織各地方救國聯合會；第四步，則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。全國性統一戰線的組織，於是告成。橫的連繫與直的系统，都極確實分明。表面為各界人士所主持，實際則為中共統戰份子所策劃操縱，無一不是中共統戰的工具。當年上海的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」，就是如此組成的。

救國會成立的經過

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」，於二十五年五月卅一日至六月一日，在上海開成立大會。據說參加者有：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、南京救國協進會

等六十餘個救國團體，以及北平、天津、漢口等十八大都市的代表六十餘人。是否真實？自然存疑。開會時，首推主席團九人。儀節進行中，有「向為民族解放鬥爭而犧牲之戰士致敬」一項。即明白顯示，此會係中共所安排。隨即由主席團之一，時年已六十四歲的沈鈞儒，上台致開會詞。繼由上海及各地代表，相繼發言。直至夜間十一時許，通過宣言後才散會。宣言中最重要的，是對各黨各派提出五項建議：一、各黨派間，停止軍事衝突。二、各黨派釋放政治犯。三、各黨派遣正式代表，由人民救國陣線為介紹人，進行談判。制定共同抗敵綱領，並建立抗敵統一政權。四、此項共同綱領，人民陣線願以全力促各黨派忠實履行。五、對違背共同綱領之黨派，人民陣線願以全力制裁。這所謂建議，實際則無一不是錐刺國民黨為共產黨張目。

大會第二日（六月一日），自上午八時至下午十一時，進行歷十五小時。通過「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」及章程十四條，還討論很多議案。大會並提出緊急動議，通電反對外交部長張羣之對日「妥協」演說，要求南京政府予以撤換。其所通過之「抗日救國初步綱領」，大體是根據中共所謂「民主政府」之十項主張，所擬定的。涉及到政治、外交、教育、商業、士兵、勞工、農民、婦女、華僑、失業與救濟各方面。關於政治者，主張各黨派合作之民主政治，保障集會、結社、言論、出版之自由。指政府原來的憲法草案，及國民大會選舉法，為聯合戰線的障礙物。要求召集經過普選的「國民救亡會議」，建立「統

一政權」一味反對政府，破壞團結，對於抗日救國的大計方針與準備進行，反而毫無議及。如此之所謂「抗日、救國」實不啻是自毀長城，自損國力。

救國會初期的活動

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之首要人物，有馬湘伯（名良，江蘇人，時年九十七歲）宋慶齡（國父夫人）、何香凝（廖仲愷先烈夫人）、沈鈞儒、章乃器、王造時、鄒韜奮、沙千里、史良、彭文應、顧執中等。馬、宋、何三人，對本會事實上很少過問。以沈鈞儒最積極，做為本會的領導人物。該會成立之後，其活動方式，首先採取請願步驟，要求政府立即「對日作戰，停止內戰」，發動各地學生罷課、遊行、煽動學潮，組織各種各色的救國團體，展開活動；出版大大小小的書報雜誌，鼓吹抗日。適其時，國民黨第二屆五中全會，召開於南京。救國會即推沈鈞儒、章乃器、沙千里、彭文應及史良等五人，組織代表團，前往南京請願。七月十三日上午十時，代表團抵達中央黨部，由馬超俊先生接待。所提四項要求，未獲具體結果。同日下午，代表團復舉行招待記者會。到各報記者三十人左右。由章乃器、史良分別報告後，並要求新聞界多予援助！次日，各報亦祇見到簡略的消息，而無其他反應。也可說是沒有結果。

旋沈鈞儒等四人，於七月十五日，復發表所謂「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」。文長八千四百餘言。要求「槍頭一致對外」。批評「安內而後攘外政策」。尤其對政府作無的放矢

的批評與攻擊；對中共種種，則盲目的極口的誇揚；深為有識人士所輕鄙。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」，既為中共所導演，其行動自然就能獲得中共的贊助。毛澤東於八月十日，曾給沈鈞儒等四人一封詳函。除大發其抗日聯合戰線的謬論外，並對沈鈞儒等，滿口予以鼓勵贊許！這對於抱有政治野心而不得意於國民政府之官僚政客如沈鈞儒輩者，實具有莫大的引誘力量。沈鈞儒等危害國家言論之行動，亦從此更為積極了。

罷工鬧事與「七君子」

自民國二十四年末至二十五年末，這一年期間之中，日本軍閥除對華北軍事侵略和外交壓迫之外。其在華中、華南各地之日軍及浪人，則到處滋生事端，大小糾紛，層出不窮。國人之反日心理，更為激昂；中共的統戰工作，也更有聲有色。於是沈鈞儒等之政治投機，亦愈積極，時時籌思在事實上有所表現，以取寵於中共，而提高其本身之政治地位。加以若輩七月間入京請願之事，未得絲毫結果，自覺頗有被人輕侮之感！老羞成怒，乃鼓動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罷工，一以擾亂治安；一以增加中日戰爭危機的嚴重性。藉以對政府亮出其顏色，作為報復或要挾的資本。沈鈞儒就曾如此坦白的向人表示過，並不隱諱。

二十五年十一月八日。上海日本紗廠的工人，受了沈鈞儒等的挑撥鼓動，果然舉行了大罷工。十二日，沈鈞儒、章乃器、王造時等，及各「救國」團體的羣衆約七百餘人，藉口紀念「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」為由，假上海靜安寺路基督教青年會的廣場集會，宣傳抗日。罷工的工人代表，

亦多參加，並登台演講，要求上海各界人士，對罷工積極予以支援；同時，在上海黃興路，亦有紗廠工人二千餘人的大集會。由罷工工人代表報告罷工的要求，及向上海市政府請願的經過。沈鈞儒及史良等，亦趕往參加演講大放謬言，恣意攻擊政府，顯有鼓動羣衆，擾亂治安，擴大事件的企圖。

政府以沈鈞儒輩，不循合法途徑，徒假抗日救國之名，憑藉外人租界掩護不斷滋事。如不早收拾，深恐禍患蔓延，為害愈烈。乃根據「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」，列舉沈鈞儒等，「非法組織團體，勾結赤匪，煽動罷工、罷課、罷市，陰謀擾亂治安，企圖顛倒政府」之罪名，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清晨，乃將沈鈞儒、章乃器、鄒韜奮、王造時、李公樸、沙千里、史良等七人，逮捕下獄。（史良為女性，旋被釋出）。時人稱快，左傾份子則譽之為救國「七君子」事件。

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」的活動，由於沈鈞儒等七人之被捕，始趨沉寂。擾攘幾近一年的上海「統戰」活動，亦死氣沉沉欲振乏力了。然未及兩旬，陝西西安叛軍劫持領袖 蔣公之事變發生。事變後四日（十二月十六日），張學良在西安羣衆大會上猶說：「蔣委員長在上海逮捕了七名救國領袖，我爲了這件事，曾單身一個人都沒有帶，乘軍用機至洛陽，請他釋放那幾位無辜的同胞。……蔣委員長決不採納我的請求」。時傳西安事變，暗與沈鈞儒等有關。觀乎張學良之言，亦可信而有徵。救國會的猖獗邪行，倘非已經制止於前，那在西安事變中，上海更不知會鬧得

什麼樣子了？

恢復活動依恃民盟

所謂救國「七君子」，以危害民國罪行被捕。無論其主觀是否真為抗日救國？而其言論行動，在客觀意義上說，總是破壞了抗日團結，違背了政府抗戰國策方針。二十六年「七七」事變發生，政府實行全面抗戰。所謂「七君子」抗日救國的主張，始無背乎政府既定的國策方針。於是七月三十一日，政府對沈鈞儒等，亦全予釋放，恢復其自由俾為抗戰効命。此七人者，就是抗戰建國時期，所謂「救國會派」的基本幹部，亦為其首腦人物。不過此輩，多係無聊的文化人士，向以左傾自鳴，與中國共產黨日常接近。因之，其行動即多受中共所指導。至於其他若干青年幹部，則早在該會沉寂時期，在中共呼喚引誘之下，已投奔陝北延安。參加了中共的青年組織，如「抗日民族先鋒隊」。「民族解放先鋒隊」，實際則皆成了中共新的基幹份子。

民國二十七年，國軍撤退至武漢。政府為集結抗戰力量，遴選各黨各派人士及社會賢達，組織「國民參政會」於武漢。所謂救國「七君子」之中，除章乃器那時已任安徽財政廳長之外，其餘沈鈞儒、鄒韜奮、李公樸、王造時、沙千里、史良等六人，則均被選為參政員，政府謀國之忠誠，於此亦可概見。沈鈞儒等初至武漢時，為擴大該會的政治影響，曾一度組織「全國抗敵後援會」。各省市亦多有此種組織。同時，猶舊調重彈，主張召開「國民救亡會議」；建立「統一救國政權」，這正是中共所要求而尚未實現者。沈

鈞儒等投其所好，因更得了中共的歡心。從此中共亦竭力支持該會，為該會之主張而鼓吹。

在武漢時期，各黨各派所組織之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、「統一建國同志會」、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；以迄後來中共新統戰工具「中國民主同盟」之成立。固皆為中共所策劃推動；而沈鈞儒及章伯鈞等，從中拉攏各黨派，促成之功亦最大。能使民盟與中共更密切的勾結，訂立「長期合作協定」；能使民盟活動經費，終無虞匱乏者（中共每月補助二十萬）；無一不是沈鈞儒等鑽營之力。因之救國會首要份子十餘人，皆得列籍民盟中委。常委佔了四人。沈鈞儒且以常委而兼青年運動委員會主委。在各委員會所佔副主委或其他要職者，亦較其他黨派為多。救國會派不但在民盟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，亦因依恃民盟，才得展開其活動，使「盟」與「派」有難離難分的關係。沈鈞儒等與中共的歷史淵源，原較民盟中任何黨派為深切！祇因本身沒有嚴密固定組織，復乏下層基礎，以致虛而不實。那時既得中共之積極支持，自然欲藉民盟之勢而騰達！於是對民盟的各種活動，亦較盟中任何黨派為賣力。一方利以發展自己；一方藉以邀寵中共。

救國會諸首要畫像

救國會派中，各上層份子之間，以無權利矛盾的因素，表面還比較合作。其中雖有南北兩派之分；但以各有所志，地緣不屬，利害無大衝突，即無顯著的裂痕。大體上以沈鈞儒為首領，似尚為各方所默許。沈鈞儒（一八七三年—一九六一）生於浙江嘉興。遜清光緒甲辰年進士。繼東渡

日本，畢業於東京法政大學。清末戊戌變法運動、辛亥革命，以及護法、北伐諸役，皆曾參與其事。以後則在上海專任大學教職及執律師業務，任上海律師工會主席。抗戰時，在重慶仍執律師業務。畫家徐悲鴻與其妻蔣碧微，三十四年在渝辦理離婚手續，沈即他們的證明律師。其人性情和順，不好計較，在民盟之中，人緣最好，向有老好人之稱。惟其貌不甚揚，身材矮小，蓄長髯髮多斑白，頗有道貌岸然之態。雖年近七十，而做官熱衷，却始終未衰。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後，以其附從叛亂有功，得任偽政府最高法院院長；中共偽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；但下場則很悲衰（見後）！該會另一最活動的人物，則為鄒韜奮。鄒為黃炎培的乾兒子。民國十五年，在上海創辦「生活週刊」，小有名聲。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利用該刊發動，藉口支援東北義勇軍，募得各界捐款十餘萬元，盡飽私囊。懼事洩漏，乃挾款外遊暫隱。海外飄流數年，二十三年回滬，改辦「新生週刊」。不久被禁。二十四年復辦「大眾生活」，主張抗日；但因反政府之故，亦被查封。旋走香港，創辦「生活日報」，仍未得志。回滬復辦「生活週刊」，再度遭禁。惟所經營之「生活書店」，出版「婦女生活」、「讀書生活」等左傾刊物，頗風行一時。生活書店，後來亦成了左傾人物的大本營。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時，既賴鄒韜奮暗中支持；黃炎培落拓於上海時，亦為鄒所牽引而出。此人對於中共「統戰運動」的貢獻，實不亞於沈鈞儒。沈為組織効力，鄒則為宣傳宣勞。祇是其人壽命不長，死於抗戰

時期，未能與沈鈞儒等，同享紅朝的「黃梁富貴」。章乃器，一八九七年生於浙江青田。學歷不高，僅在浙江省立商業學校畢業。一向在銀行界服務，曾任浙江實業銀行副經理。以在銀行界所得經驗學識，間亦兼任大學教授。在「七君子」中有「資本家」之稱。二十五年，與沈鈞儒等除組織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」外，尚有「中國文藝家協會」、「文藝工作者協會」、「上海著作人協會」、「上海各界緝私大同盟」、「上海學生救亡同學會」等。這雖不屬「救國會」，亦多被中共所利用。章乃器也可算是中共統戰運動中的一員大將。抗戰初期，任安徽財政廳長。在中共偽朝中，則任偽糧食部長，仍歸屬於其財經本行。中共實行大鳴大放後，章以資本家餘孽被圍攻，卒打入右派，加以整肅。李公樸，江蘇揚州人。留美學生。在上海曾任量材（紀念記者史量材）圖書館長。亦所謂救國「七君子」之一。三十五年七月，在昆明被刺。中共與民盟皆誣指為國民黨所害。經民盟派梁漱溟赴昆明查證，知係中共的苦肉計，民盟亦不敢宣佈。他如沙千里，為領導上海職業界救國聯合會的首腦。史良（女性、江蘇無錫人、上海法政大學畢業、業律師）則為領導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的首領。她與上海律師王造時，皆以業務上的關係，才與沈鈞儒結識而合作的。故所謂救國「七君子」者，初皆名不見經傳之人。直可說是中共的統戰工具，以左傾搗亂而起家發跡的人。

各自為謀找新出路

救國會派，原無一定與確實的組織，僅以空招牌作為中共統戰策略臨時的工具。其首要份子，因左傾而成名，坐牢出獄以後更囂張。他們為保持自認為光榮的歷史與地位，仍不得不左傾到底。對日抗戰時期，該派由於中共的提攜，而日益壯大。抗戰勝利以後，中共叛國暴行愈甚。該派首要份子，不但附和中共種種狂妄主張，且為之歌頌鼓吹不已。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，沈鈞儒、張申府等，均以民主同盟代表的資格參加。沈鈞儒且擔任了民盟與中共間之聯絡工作。政治協商會議以後，國共兩黨的問題，在「雙十會談紀要」中，並沒有得到確切解決。因而才有政府與中共的談判。談談打打，打打談談，又復多時。終以中共毫無解決問題的誠意，遂使和談停頓。中共乃在全國各地，進行全面武裝的破壞。沈鈞儒則始終沉迷於中共的叛亂武力，必可獲勝。公開的向人表示說：「中共到處挑起戰爭，使全國不能安寧，人民無法生活，國民黨就非垮台不可。即使有美國幫助，頂多延長一年兩年」。如此幸災樂禍的心理，直是助紂為虐，禍國殃民，出賣民族。顯然與國民黨完全是處於敵對地位。

可是經時未久，正有一相反的事實出現。即由於時局環境的變化，引起民盟內部意見紛歧，大有即將瓦解之勢。民盟內部各派，深恐民盟一旦崩潰，其勢必難自存。因之各自為謀，紛紛另找新的出路。沈鈞儒一向是對國民黨幸災樂禍的人，此時則一切危機，都轉到自己頭上來了。因為該派實太空無所有，新的出路難求。死裏偷生的辦法，將救國會改組為「人民建國會」。採取

單獨活動，亦不與團體名義加入民盟。同時，先後由陶行知、李公樸等，在重慶開辦所謂「星期學院」及「社會大學」。沈鈞儒、沙千里等，則在上海組織各種團體，如「中華婦女聯誼會」、「救國進修社」、「職工勞動福利互助社」。並創辦「正行女中」、「清華學院」等積極吸收職業青年及勞工羣衆。且師章伯鈞的故智，暗中以黨制盟，以盟養黨，為人建會發展的方針。沈鈞儒更圖利用其「民盟青年運動委員會主委」之優越權勢，加強掌握青年及文化運動之領導地位，為其所謂「人民建國會」建立基礎。終因資本短絀，運用不靈，仍不過小店經營耳。

兩不討好人物星散

救國會派，在民盟之中，原來雖佔相當重要的地位，並受中共的垂青愛顧；但其首要份子，對中共之偏激態度與反復無常，却很不滿意。加以對民盟的指望，已感空虛，前途渺茫。而自己所理想的新出路，發展又極不順利（遭羅隆基等攻擊）。沈鈞儒會氣憤的對人說：「我等奔走迄今，僅被共產黨利用，國民黨卑視，所獲安在」？這自然是「良心話」。即可見其內心之苦悶，才不覺溢於言表。曾有組織「自由社會黨」之說，也不過是書生空論罷了！沈鈞儒意志之消極，自不限於中共問題、民盟問題。使他最頭痛的，還是救國會派本身凋零的問題。

救國會派，原為沈鈞儒等領導之「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」，及張申府等所領導之「華北人民救國會」聯合而成。故有南派北派之分。抗戰勝利後，正是國共鬥爭緊張之時，張申府則率其羣

衆，不告而別，到華北去打天下去了。章乃器原是財政金融界的人物，此時則積極追求財富與做官，已走向所謂資本主義式的民主道路。史良則已加入了共產黨非復救國派人物。李公樸不明不白被刺於昆明；鄒韜奮與陶行知，則已先後病逝；王造時其時則擬遠走南洋辦報。所謂救國會派，原來就是有名無實，僅靠幾個上層份子撐住場面。這些上層份子，又都零零落落星散，怎不教沈鈞儒頭痛消極；如果祇有孤家寡人一個，還成什麼派？還有什麼好玩？

沈鈞儒心猶不甘，亦因騎虎之勢，認為不能就此喪失其政治地位，拋棄其政治集團。否則，將無立身之地。故政府頒佈總動員令，實行戡亂剿共之後。沈鈞儒猶力圖掙扎為加強該派的力量與活動起見，特在上海召集其幹部會議。首先安慰其幹部說：「兩個月之後，共軍即可全面獲勝，打敗各地國軍，主持政局」。強調「共產黨獲勝，救國派仍有光明的前途」！沈鈞儒對其幹部們，打了這一嗎啡針之後，幹部會議，亦仍決定擁沈鈞儒為該派負責人；王造時暫仍擔任民運及組織工作；沙千里担任宣傳及調查工作；史良則主持西南各省地方會務仍藉民盟為掩護，從事發展。並派沈滋九、李滋達等，主持港、粵及海外會務；于毅夫主持華北對東北會務。且擬拉攏南洋華僑鉅子陳嘉庚，聘為該派副總負責人或高級顧問。同時，派于毅夫代表該會，參加中共在東北所組織之所謂「東北行政政治委員會」。這就是該派在衰落時期所作的新發展，實際則仍不過敷衍門面而已，黃昏夕陽，欲振無力。

交心洗腦打入「右派」

救國會派，自武漢時期恢復活動以來，既無羣衆基礎，又無固定實在的組織，更之自主的政策主張，徒然仰人鼻息，俯仰隨人。所謂救國「七君子」時代，雖曾大出風頭；但好景不常，瞬成過去。惟其首要份子，均以「左傾起家」，便不得不託庇於中共，寄生於民盟，受中共的奴役，供民盟以自市。組織早已有名無實，其實連「名」也是多餘的。迫民盟被迫自動解散後，在情理上，該會便無活動餘地了。其時，民盟中的各黨派，全都大起恐慌，紛紛尋找退路或個人安身立命之處；有的仍追隨中共，在政府區轉入地下工作；有的則上梁山、入共區，或宣佈解散；有的則轉移陣地，遷至港、澳或南洋，靜觀其變。至民盟各首要份子個人態度，亦多曖昧難明。如張東蓀，則潛赴華北，暗作其他活動；張伯鈞表示：暫時避居香港；黃炎培表示：將息影上海，埋頭著書；羅隆基表示：將赴杭州休養身體；梁漱溟表示：仍居重慶北碚，不作任何活動；救國會北派首領張申府表示：專心教書；南派首領沈鈞儒依老賣老表示：「決不離滬，今後將仍在上海執行律師業務」。事實上，民盟已到了分崩離析狀態，所謂救國會派者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中共竊據中國大陸以後，便將抗戰時期百餘黨派，不論其是否附庸？大加整飭剔除。最後僅僅保留八個，作其統戰策略運用的工具。附庸中共歷史最久與最忠實的救國會派，亦被中共宰掉併入民盟之中。原屬有名無實的所謂救國會派，至此則名實俱亡了。

至該派首要份子，此時所存者，不過寥寥二、三人而已。中共偽政權成立之初，也都做了大官，成為紅朝的新貴。如沈鈞儒就是偽最高人民法院院長，偽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；章乃器、史良等，亦皆列身於偽政府部長階級。這並不是中共對彼輩有所偏愛、或對「功狗」的酬庸，實由於中共統戰策略的需要，仍不能不暫時利用。迫經過中共實施三反、五反、鎮反、思想改造、欺騙、奴役、大鳴大放之後進行「反右派」鬥爭時，就免不了兔死狗烹了。原來救國會派的角色，

過不了關的，都被打入右派，加上「反共」罪名，撤銷本兼各職，予以整肅。各派所有首領人物，如沈鈞儒之流者，還要貫徹「交心運動」。身懸「交心牌」，遊街示衆；寫「交心書」，如立賣身契約。最後還要關進所謂「社會主義大學」，澈底洗腦。

腦子不夠中共所要求的清澈，將可監禁在校終身。八十多高齡的沈鈞儒，受盡如此折磨侮辱，正如其自己所云：「所獲安在」？其精神之痛苦，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。

輓

王

洗

教

授

王成聖

編者按：王洗先生字道之，江蘇武進人，早歲兩度奉派赴美研究水運，考察航政航運設施，返國後歷任長江區航政局長，軍委會四川船舶總隊少將總隊長，交通部造船處處長、航政司長，台灣航業公司董事長等要職。先後兼任交通大學、成功大學、臺灣師範大學、海洋學院、中國文化學院、國防研究院、三軍大學等校教授，著作等身，桃李滿天下，年來為中外雜誌撰寫有關航政掌故專文深獲讀者愛重，王先生不幸於本年九月病逝台北，本誌發行人王成聖聞耗曾親往王府悼唁慰問家屬，茲錄誌王發行人所撰輓詩如后：

越洋研水運，報國展鴻圖。航政殫心力，單差暢轉輸。
弘文當代重，振鐸萬流趨。耆舊傷零落，愴懷莫末弔。